

环境史视野下的抗战史书写

——评穆盛博《中国的战争生态学： 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

张 岩

《中国的战争生态学：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环境与历史研究》(Studies in Environment and History)系列丛书^①的一种。作者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为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曾在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历史系、乔治城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为牛津大学墨顿学院中国史教授。穆氏的学术兴趣专注于中国环境史,综其研究特色,大略有二:第一,研究指向上,致力于从历史角度——“历史上人们如何引起、感知及因应环境变迁”——理解中国当代的环境挑战。^②以此为旨趣,作者于2009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便是通过揭示人类对舟山渔业资源开发与支配的历史,来探寻中国当下面临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目前作者正在进行的“中国水土保持史”研究同样具有这种立足现实的特点。第二,研究方法上,注重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探讨,尤其在本书中,作者运用“以能量为中心”的方法(the energy-centered approach),对战争与环境(也是“人与自然”)关系提出了新的阐释模式。

本书的研究,主要围绕两大事件展开,一个是“花园口掘堤事件”,一个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对于前者,过去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军事史,如讨论国民党军队掘堤行动的军事意义^③;后者则多被纳入灾荒史,如讨论此次饥荒的发生原因、造成的损失(主要指人口死亡)及相关救济措

*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① 该系列丛书在环境史研究领域享有盛名。它的宗旨在于研究“在整个历史与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间的互动”,侧重“新的历史分析方法——例如生态学的应用”,“以有助于对历史事件、文化模式和社会组织的解释”。

② Micah S. Muscolino, *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p. 2. 中译本参见穆盛博著,胡文亮译《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③ 在此问题上,持肯定态度的研究占主流。参见渠长根《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一):从抗日大战略的形成到武汉会战(1931—1938)》,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447—449页;方德万著,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23页;拉纳·米特著,蒋永强等译:《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页。上述研究认为掘堤打破了日军西进的计划,迫使日军南下,国民党当时做出这一决策具有战略上的正当性。

施等问题。^① 本书把两个事件、两个主题联系了起来,把事件的人类要素与非人类要素联系了起来,开辟了军事与灾荒、战争与环境的综合研究,这意味着无论是对于军事史还是对于灾荒史、环境史,都是一种主题的深化。

二

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作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史学方法,至今尚未形成固定的研究范式,其重点是从历史的视角探讨人与环境(或自然)的关系问题。例如,环境史开拓者之一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认为环境史的主要目标是理解“在时间变迁中,自然环境如何影响到人类,反过来,人类又是如何影响到环境以及会出现何种结果”,通俗地讲,“环境史讲述的是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② 伊懋可(Mark Elvin)称环境史就是要“透过历史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其他自然系统间的界面(即‘相互作用’——引者注)”。^③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④,迄今 20 余年的时间里,该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主题涵盖“环境与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与国家”“环境与社会”等等。^⑤

本书涉及的是“环境与战争”这一主题。围绕这一主题,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世界环境史领域,当然这中间也不乏会出现有关中国的章节;而在中国环境史领域,除本书外,笔者尚未见有其他著作做过专门研究,应该说本书是第一本书写中国战争的环境史专著。^⑥ 其鲜明的特点就在于它

^① 如,江沛:《“哀鸣四野痛灾黎”:1942—1943 年河南旱灾述论》,《河南大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陈清敏:《抗战时期河南省的灾荒与救济(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中华技术学院学报》2007 年 6 月;Anthony Garnaut, “A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the Henan Famine of 1942”,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7, No. 6 (2013), pp. 2007–2045。

^② 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90–292.

^③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 2000 年版,第 8 页。有关环境史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曾华璧综合各方之论,认为环境史探索的目标在于“将自然、社会和经济组织、思想与欲望,以及政治等问题,化合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对象,而此一对象的整体变迁,被型塑成一个纵横古今的、但又不同于传统的特殊研究题材”(曾华璧:《人与环境:台湾现代环境史论》,台北,正中书局 2001 年版,第 10 页)。涉及环境史学术史的著作,可参考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Malden, MA: Polity, 2016) (中译本参见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④ 伊懋可教授、刘翠溶院士应属最早发起推动者,由其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此论文集为 1993 年 12 月在香港举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讨会的成果)应为“中国环境史”的开山之作。

^⑤ 涉及“环境与政治”的如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涉及“环境与经济”的著作如 Robert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译本参见马立博著,王玉茹等译《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涉及“环境与国家”的如 Ling Zhang, *The River, the Plain, 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 1048–11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涉及“环境与社会”的如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年版。中国环境史的通史性著作,如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中译本参见伊懋可著,梅雪芹等译《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有关环境史在中国学界的研究状况,亦可参考 Maohong Bao,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10, No. 4(2004), pp. 475–499。

^⑥ 在世界环境史领域,该主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美国内战等战争。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如 Edmund Russell, *War and Nature: Fighting Humans and Insects with Chemicals from World War I to Silent Spr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如 Chris Pearson, *Scarred Landscapes: War and Nature in Vichy France* (Basingstoke Engl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涉及冷战的如 J. R. McNeill and Corinna R. Unger eds.,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涉及美国内战的如 Brian Allen and Drake Project Muse eds., *The Blue, the Gray, and the Green: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5)。

使用“以能量为中心”的方法解释环境与战争的关系。据作者介绍,所谓“以能量为中心”的方法,指的是“追溯能量在社会、环境及二者之间的流动”,通过这种方法探讨“河南战时的生态灾难及其后果”,就可以“把战争、洪水与饥荒联系在一起”。在作者看来,军事系统如生物体一样,亦存在“新陈代谢”(metabolisms),需要从环境、社会吸收能量——如食物、燃料、建筑材料及其他资源,并排放出废物。^①这便是本书所建构的“战争生态学”的分析框架。

在生态学尤其是社会生态学领域,透过“能量”“能量流”“物质流(materials flow)”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是一个专门的研究范畴。举一个作者从中受到启发的研究案例,社会生态学者玛丽娜·费舍尔·科瓦尔斯基(Marina Fischer-Kowalski)与赫尔穆特·哈伯尔(Helmut Haberl)主编的《社会生态的变迁与全球变化:社会新陈代谢与土地利用的轨迹》一书便是使用“物质与能量流核算”(the material and energy flow accounting,简称“MEFA”)方法,讨论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变迁历程。所谓MEFA方法指的是“以社会经济新陈代谢的概念为基础”,透过“追溯社会经济的物质、能量流动”,分析社会与自然间的互动作用问题——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科学致力于探索的问题。^②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的《环境史》系列丛刊(Environmental History Series)也出版过一本专著《社会新陈代谢:关于历史变迁的社会生态学理论》,系统介绍“社会新陈代谢”的起源、历史以及类型等问题。^③相对而言,本书所谓“新陈代谢”的主体,即与环境进行“能量变换”的系统,并非“社会经济系统”,而是“军事系统”,此即本研究的一个创新所在。^④

“能量”本身是一个抽象的自然科学概念,在物理学中它被定义为“做功(do work)的能力”——其中“功”指物体受到力的作用,同时还要在力的方向上发生位移。然而这一概念并不见得会出现在历史资料中。那么,在当时的语境下,与“能量”一词对应的词汇是什么?作者发现,在战时河南的资料中,与之对应的是“力”(power),如民力、兵力、人力、物力、畜力等;若涉及黄河的“能量”,则对应另外一个汉字“势”(position-power),如水势、流势等。^⑤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黄河之“势”在中文史料中具有多重意思,如“黄河水势浩大”中的“水势”指“水的流量与冲力”,“黄河水势暴涨”中的“水势”指“水位”。

本书的研究区域并未涵盖事件发生的全部范围,而只界定在河南的郑县、中牟、尉氏、鄢陵、太康、扶沟、西华、淮阳以及鹿邑九县,这些县份均属黄泛区的豫东泛区(也可以称作“河南泛区”);随着两次灾难中难民的迁移,作者还关注到了难民迁入地陕西的状况。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军事系统从豫东泛区“饱受战争蹂躏的环境汲取能量”,使得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陷入无序并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基于此,本书的论述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即“敌对的军事各方如何试图去利用生态系统,以及因为他们的介入而引发的生态畸变(distortions)”。此外,本书还从“社会

①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p. 4–5.

② Marina Fischer-Kowalski and Helmut Haberl eds., *Socioecological Transitions and Global Change: Trajectories of Social Metabolism and Land Use* (Cheltenham;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7). 关于MEFA见Helmut Haberl et al.,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ility? What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Material and Energy Flow Accounting (MEFA) Can Offer”, *Land Use Policy*, Vol. 21, No. 3 (2004), pp. 199–213。

③ Manuel González de Molina and Víctor M. Toledo, *The Social Metabolism: A Socio-Ecological Theory of Historical Change* (Cham: Springer, 2014).

④ 在环境史研究其他主题上应用“能量”方法的案例如:Alan Mikhail, “Unleashing the Beast: Animals, Energy, and the Economy of Labor in Ottoman Egyp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8, No. 2 (2013), pp. 317–348; Edmund Burke III, “Human History, Energy Regim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 eds.,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p. 33–53。

⑤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p. 9–13. “position-power”是伊懋可对“势”的翻译,作者使用这一译法,倾向表达其“力量”的含义。

史”角度叙述了泛区的难民如何“竭力获取能量以求生存”的故事,同时也探讨了难民生存策略的社会、生态影响。^①

三

本书内容凡七章,另有前言与结论。第一章讲述1938年国民党军队的黄河掘堤行动,与之后中日双方水利工程的修筑及其地方影响。作者从“能量”角度重新诠释了国民党军队的掘堤行为,认为黄河虽然蕴藏巨大的“能量”,但能量本身只能“做功”(do work),除非“按照人类的动机和欲望”加以利用才能产生“力量”(power),“花园口掘堤”便是国民党军队为对抗日军,把黄河能量转化成力量(即所谓“以水代兵”)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起到了“改变敌人的能量需求”,也就是“增加日军军事行动的能量成本以及其他后勤方面需求”的作用。作者接下来指出,在掘堤以后,中日军事双方为继续推行“水利工程计划”,即“让河水改变方向以巩固他们的军事地位并加强他们的力量”,就需要从河南泛区各县动员大量的能量(即劳力和物资),以此来操纵和对抗河流;而地方也“力图将这些能量留予己需”,由此围绕能量(与力量)展开了一场争夺大战——这种争夺“不单出现在中、日军队之间及在军事力量与河水之间,而且也在军队及被他们剥削的地方社会之间上演”。^②最后作者指出,这一“扭曲的”能量流动“给地方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③

第二章讲述泛区难民的迁移、营生策略、在陕西的安置与土地开垦以及这些行为的生态后果。1938年黄河洪水致使河南117万余难民背井离乡。作者认为,泛区水利和农业生态系统的管理必须依靠能量——大部分来自“人的体力”(human muscle power)——的输入才能维持。然而随着难民西迁,泛区的能量变得日益匮乏,以致“脆弱的人工景观(human-constructed landscapes)陷入混乱和无序”;另外,洪水和难民迁移,也给黄泛区野生动物与疾病微生物的生长提供了“生态空间”(ec niches)。^④接下来作者大致从两方面叙述了难民营生策略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人们主动适应环境采取了各式各样的策略,包括传统习惯性的生存策略,如农闲时离家打工、参军、拾荒、乞讨等等,还有些难民在新黄河的大堤修成后又返回故乡耕作;另一方面,环境也为人们创造了“新的经济机会”,较典型的就是新黄河西岸国统区与东岸沦陷区的走私贸易,并且“洪水带来的环境变化也催生出了不少走私的特殊形式”,如洪水引起的土壤盐碱化,促生了制盐、卖盐的活动;此外,也有一些营生策略如砍伐、贩卖树木等燃料,给“黄泛区有限的资源基础增加了压力”。^⑤当这些策略于事无补的时候,大批难民开始流往陕西省的黄龙山垦区——战时最大的难民垦荒区。国民政府对此也相应实行了安置与土地开垦的措施。但在作者看来,政府此举除“使难民自给自足”以外,也存在“开垦荒地与提高粮食产量”以“创造剩余能量供养战争”的目的,这给当地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⑥

第三章讲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发生的原因以及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应对饥荒的办法,即在粮食供应问题上的策略。作者指出,过去学界对于饥荒原因的解释主要是“从人类主体动力(human agency)角度”出发,“忽视人类与非人类因素合力促成饥荒的复杂形式”,而“要理解战争与饥荒的生态学,就必须从人类参与者(human actors)与动态环境(dynamic environment)的交

①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 12.

②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p. 22–23.

③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 58.

④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 85.

⑤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p. 68–77.

⑥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p. 79–86.

互作用着手”。为此,作者提出要把“战争的生态动态(ecological dynamics)作为战时饥荒发生的一个变量”。这里的“战争的生态动态”指的是“人与不断变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战争而发生的变化”。基于此,作者阐述河南饥荒的发生机制大略如下:花园口掘堤引发洪水泛滥,破坏了环境基础设施,降低了粮食产量并阻碍了外部的粮食输入;短期的气候变化以及蝗灾又加重了农业减产的程度;然而为满足军事新陈代谢的需求,军队还是要向本已衰败的河南汲取大量的能量。这一将能量引向军事系统的举措,扭曲了河南当地的食物权利关系(food entitlement relations),最终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出现食物短缺的“能量危机”。^①谈及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获取能量的策略,通过对比,作者认为后者更有能力控制与利用能量和资源,如能够适时调整粮食供给制度(包括征收制度),开展“武装保卫麦收”等护粮行动;共产党所表现出的这种能力也“解释了抗战后期他们在豫东的成功”。^②

第四章是第一章内容的拓展与延伸,讲述了新黄河两岸国统区、沦陷区的堤防建设及其生态成本,以及地方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作者指出,新黄河的堤防建设无论对于国民政府还是日本方面,都在国防或战略上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河水的上涨与转移并不会考虑人类的意图”,“若无能力支配人与自然的能量,就不可能去控制黄河的水流”。^③作者大致从两方面论述了“水力不稳定”(hydraulic instability)的构成因素:一是自然方面,新黄河严重的淤积、水流的漫延倾向以及恶劣天气如大风与暴雨,加大了水利设施的维护成本与脆弱性;二是人为方面,饱受战争、洪水与饥荒蹂躏的河南泛区并没有充足的能量(即劳力与物资)投入水利的维护(即河防),而国民政府也没有给予财力与物力的资助。作者强调,“战争以及水利维护不顾一切地吞食了那些用来恢复农业生产的能力,使灾难变本加厉”,最终“耗尽了地方社会的力量(power)——做功的能力”。^④

第五章讲述河南泛区“饥荒难民”(区别于第二章“水灾难民”)的迁移及其社会、环境影响。就社会方面言之,作者认为“二战时期军事冲突与生态剧变引发的迁移,彻底改变了地方社会的结构”,尤其从性别维度来说,“战争及其导致的生态灾难显著减少了河南泛区体格健全的成年男性的人数”,女性比例相对升高,这一“人口结构的转变”,使女性不得不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肩负起更多的农活”。^⑤就生态方面言之,作者指出,难民在陕西黄龙山的土地开垦以及诸如砍树卖柴、烧制陶器之类的营生策略,引发了土地退化等环境问题,但不同时期迁来的难民对此和受此问题的影响程度是有差别的。第一波“1938年黄河改道后立刻来到黄龙山的难民从国家支持的安置计划中获得了更多益处,且对该地区自然景观的变化影响似乎更大一些”;第二波“伴随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而来的难民”虽然“对环境影响不大”,却承受了更多土地退化带来的生态恶果,以致“生活在更加绝望的状态之下”。^⑥此外,作者还指出,对于植物群和生物群来讲,难民的一些生存方法如吃树皮树叶、猎食动物等也造成了植被的破坏、牲畜数量上的损失等影响。^⑦

①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p. 88–90.

②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p. 113–117, 119.

③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 141.

④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p. 120–135, p. 138, p. 141.

⑤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p. 155, 169–170.

⑥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p. 163–170.

⑦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p. 147–149.需要补充一点,本章介绍泛区饥荒难民的苦难经历时,使用了尉氏县卞庄村农民王氏的例子,但王氏应该归为“洪水难民”还是“饥荒难民”尚有不明确之感。据作者解释,因王氏兼具这两个身份,故此处不再特意区分。该案例参见梅桑榆《花园口掘堤前后》,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336页;梅桑榆:《血战与洪祸:1938年黄河花园口掘堤纪实》,中国城市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264页。另外,该部分引用的刘灿若的《先生,给我想个办法吧》一文应该是出自《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周报》1947年第83期。

最后两章讲述“战争(给泛区)所带来的破坏程度以及战后农业生态恢复的过程”。^① 作者指出,虽然抗战结束,河南黄泛区的重建工作也急需劳力,但大多数外迁的难民却不愿回到“能量匮乏”、难以满足他们“新陈代谢”需求的家乡。泛区的“能量匮乏”广泛体现在战后地貌景观、疾病环境、土壤状况、有机能源与农具匮乏、燃料与木材稀缺等方面。作者认为,“重造一个有生命力的乡村社会的生态基础,没有人类参与者加入是不能实现的”,正是受惠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的外部介入——能量与物资输入,加以“当地共产党机关从事的重建计划”,泛区的重建与恢复工作才得以开启。从1946年开始,特别是到1947年花园口堵口以后,难民大量返乡垦地,这些能量的输入加速了重建及恢复的进程。^② 此外,作者也关注到了在此时期国共内战与环境的问题,尤其是生态的变化对于军事形势的影响。作者注意到,在花园口未堵口以前,新黄河西岸与东岸的国共军队殊有战事,“但随着水障消失,双方就开始争夺控制权,由此而形成紧张态势”,共产党对河南泛区“实施直接的军事控制”也是在当地“收到大量物资、设备以及人口返回”以后。^③ 作者还指出,相对国民党而言,共产党在“吸引民众回到解放区”及“动员劳力开展土地复垦与恢复农业生产”等方面表现得更为“内行”。^④ 到新中国成立时,泛区粮食的产量已经超过战前。在作者看来,这一成果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20世纪40年代的重建与恢复工作为之奠定了基础;然而,“即使在战后复苏以后,河南的环境依然高度退化”。^⑤

四

根据生态学的观点,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是围绕人与自然关系展开的,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本质是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过程。本书以能量为中心展开战争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把握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内容。与社会生态学“能量”方法的运用——如MEFA方法——不同,本书并非侧重对“能量”进行量化研究^⑥,而是将“能量”及其相关原理上升到哲理层面,再作为方法论用于历史研究。对于历史叙事而言,“能量”方法的运用不仅可以使环境的质素融入历史书写当中,而且也揭示了多种历史要素(如社会与环境、中央与地方)之间、孤立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拓宽了传统历史叙事的面相——借用作者的话说,即改变了传统历史叙事的标准。^⑦

除研究方法以外,本书还有两方面可圈点:就史料而言,本书应用的档案资料所涉颇广,囊括了台北“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河南省、陕西省、郑州市、黄河水利委员会、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等档案馆,联合国档案和记录管理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国民政府、地方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教会等方面的档案。此外,作者也广泛搜罗了不少已出版的原始史料,包括报纸杂志、官方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录或口述记录,如《睢杞太地区史料选》中辑录的原水东独立团参谋长陈子植保存的工作报告^⑧、梅桑榆1991年在河南采

①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 172.

②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p. 173–200.

③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 220.

④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 223.

⑤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 230.

⑥ 当然也有环境史的研究注重量化分析,如Edmund Burke III, “Human History, Energy Regim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 eds.,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⑦ 穆盛博:《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势》,《江汉论坛》2014年第5期。

⑧ 《水东独立团一九四三年工作报告》,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睢杞太地区史料选》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221页。

访黄泛区难民幸存者的记录^①等。可以看出作者在史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就论点而言,综合以上所述各章内容及结论部分,本书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三条:第一,国民党为利用黄河的能量抵挡日军的力量,掘开黄河大堤,造成黄水泛滥,但此举只起到了短期延缓日军进攻的效果,之后中日军队为操控河流达其军事目的,增加了对地方的能量汲取,由此给地方生态与社会带来了极大破坏,为国民党在河南泛区的军事崩溃埋下了伏笔;第二,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在河南的力量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并能够有效汲取他们生存所需的能量,这种差别与两者战术的选取有很大关系——相对国民党的阵地战而言,共产党依赖的游击战使之具有更大“机动性与灵活性”,由此两者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命运;第三,军事系统的新陈代谢极大消耗了地方用于维护农业生态系统的劳力和物资,洪水也带来部分劳力与物资的损失;与此同时,难民迁往陕西又使大量劳力外流,在这种状况之下,地方本身并没有能力重建一个“有生命力的人类生态秩序”,一直到战后,联总与行总输入大量能量吸引劳力还乡,才使泛区的恢复成为可能。^②要而言之,透过“以能量和能量流为中心”的研究,作者认为“军事与社会的新陈代谢塑造了指挥官的抉择、共产党的命运以及环境变迁的进程”。^③作者这种从“能量”角度评价花园口掘堤行为,解释国民党政治、军事的失败以及共产党的崛起,探讨河南大饥荒的发生机制以及黄泛区环境变迁的研究方法,颇具新意,突破了传统军事史、灾荒史、政治史的思维束缚。

当然,本书研究尚有可以继续深入的空间。首先,涉及中日双方新黄河堤防建设等问题,作者未使用日军方面的档案;受当时档案开放程度及篇幅的限制,国民政府一方的档案也未能充分利用,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就藏有大量与此相关的材料。如果继续深挖这些档案,或可进一步充实其论述或引出其他议题。其次,囿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作者也未能将花园口堵口工程这一重大事件纳入研究视野。实际上,堵口本身就是人力与水力的一种较量,此间还借用了西方机械的力量,因此《黄河堵口工程》即评价“黄河之合龙,是为西方机械与我国人力伟大合作之成就”^④;堵口过程所涉及的摊派工料、征派民工等问题,也与河南泛区不无关系,所谓“工料”“民力”也是作者所称的“能量”;在此过程中也涉及了国共之间的角力,因此应该可以从能量角度作专门探讨。再次,河南泛区的区域特征体现得似乎还不够明显,如相对安徽泛区、江苏泛区有哪些特征,相对河南大饥荒中其他受灾区域又有哪些特征等等。^⑤

总体而言,本书为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思路,其研究方法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也很有参考意义。

〔作者张岩,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梅桑榆:《花园口掘堤前后》;梅桑榆:《血战与洪祸:1938年黄河花园口掘堤纪实》。

② 本书结论部分参考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p. 236–237。

③ 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 5.

④ 《黄河堵口工程》,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版,第16页。

⑤ 至于“军事新陈代谢”排出的废物问题,本书并未涉及,这也是本书结构上的一个遗憾。作者在结论部分也做过解释,主要的原因在于缺少这方面的资料。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p. 237.